

主编 皮明庾

武汉通史

中华民国卷(上)

涂文学 主编



武汉出版社

武汉通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殷增涛

副主任 车延高

杨卫东

顾问 章开沅

编委 张述传

刘志辉

彭小华

周茂棣

刘东才

涂文学

朱英

姚卫东

周才志

李策

朱毅

皮明麻

冯天瑜

李强

余茂才

唐惠虎

易福才

刘玉堂

陈芳国

严昌洪

郑自来

徐明庭

刘顺妮

朱雷

方精华

张福来

程玉平

聂建新

李怀军

吴剑杰

洪涛

张启亮

刘庆平

武汉通史编者

主 编 皮明麻

副主编 刘玉堂 涂文学

李怀军 陈芳国

武汉通史·民国卷(上)作者

主编 涂文学

作者 涂文学 宋晓丹 傅才武

周德钧 李卫东 蒋敏华

刘志斌 李怀军 张广立

皮明麻

前言

涂文学

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1949年5月16、17日武汉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中,武汉作为近代都会经历了社会转型,政局反复变动及经济的大起大落。武汉在民国时代是都会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时代,是政局动荡的时代、过渡的时代、曲折多变的时代和困难重重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斗争一浪一浪兴起的时代。

武汉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2年到192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阶段,其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都会经济短暂发展期;

第二阶段是1926年秋到1927年7月的武汉国民政府阶段;

第三阶段是1928年到193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阶段,其中有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期;

第四阶段是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的日军沦陷武汉阶段,城市呈现殖民地化下的衰退;

第五阶段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治武汉和最终崩溃的阶段。

在这五个阶段中,都会的社会性质、结构发生巨大变动,战火对城市造成毁坏。1931年的大水又给武汉以重创。特别是日军的法西斯统治,造成了武汉的浩劫。在这种背景下,武汉的革命斗争持续高涨,在大革命和抗战初期,武汉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经历了政局和社会的剧变,最后迎来了武汉的解放。

目 录

前言	涂文学(1)
第一章 民初鼎革和北洋军阀统治	(1)
第一节 首义精英的涌现和民初政治力量重组	(1)
第二节 黎元洪拥袁自固	(5)
第三节 倒黎反袁风暴	(9)
第四节 “二次革命”的流产	(15)
第五节 黎元洪离汉和两段入鄂	(19)
第二章 王占元的“鲁人治鄂”和萧耀南的“鄂人治鄂”	(24)
第一节 王占元拥袁上台,上台拥袁	(24)
第二节 武人、贪官和江宽轮事件	(27)
第三节 湖北自治运动和武昌兵变	(31)
第四节 湘军援鄂和王占元下台	(35)
第五节 萧耀南督鄂和吴佩孚的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部	(38)
第六节 将军团与萧耀南	(41)
第七节 流产的武汉建国政府	(43)
第八节 萧耀南暴卒后的武汉政局	(45)
第三章 民初汉口复建和城市现代变迁	(49)
第一节 重建汉口和新的市区中心形成	(49)
第二节 内陆开放型中心城区的形成和民初经济发展期	(61)
第三节 转型中的城市文化	(68)
第四节 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步和扭曲	(80)

第四章 “五四”运动和中共在汉早期活动	(91)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91)
第二节 “五四”风涛涌江城	(94)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在汉传播	(100)
第四节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07)
第五节 中共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开拓	(111)
第六节 江岸“二七”惨案	(113)
第七节 武汉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115)
第五章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	(122)
第一节 战前态势	(122)
第二节 围攻武昌,占领汉口汉阳	(123)
第三节 攻克武昌	(127)
第四节 唐生智第八军首入武昌城	(129)
第五节 叶挺独立团烈士陵园	(132)
第六章 武汉国民政府始末	(134)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定为国都	(134)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巩固政权的努力	(137)
第三节 宁汉对立和反蒋斗争	(143)
第四节 “一三事件”和收回汉口英租界	(147)
第五节 武汉建市	(148)
第六节 风雨飘摇的武汉经济	(152)
第七节 中共与工农运动	(155)
第八节 “七一五”分共和武汉国民政府终结	(164)
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武汉的统一和统治	(175)
第一节 中共“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	(175)
第二节 年关暴动流产	(177)

第三节	宁汉离合和李宗仁、唐生智之战	(180)
第四节	桂系胡陶统治	(182)
第五节	蒋桂战争	(188)
第六节	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	(193)
第七节	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7)
第八节	杨永泰被刺	(207)
第八章	1931 年水淹三镇和民国水患	(211)
第一节	1931 年水淹武汉	(211)
第二节	1935 年水患和防水奏效	(217)
第三节	东西湖水患和血吸虫病	(220)
第四节	修建金水闸和火烧金水农场	(223)
第九章	保卫大武汉	(229)
第一节	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229)
第二节	“保卫大武汉”的军事决策	(237)
第三节	武汉会战	(240)
第四节	武汉沦陷	(249)
第五节	武汉会战中的经济和工厂内迁	(252)
第六节	抗战初的武汉文化救亡热潮	(256)
第七节	武汉会战的成败	(278)
第十章	武汉沦陷七年的殖民统治	(283)
第一节	武汉沦陷与日军暴行	(283)
第二节	日军在武汉市郊制造的血案	(289)
第三节	汉奸政权的演变	(295)
第四节	日伪统治下的城市变态	(304)
第五节	殖民经济	(323)
第六节	日伪控制下的社会文化	(327)

第十一章 武汉外围抗日斗争和日伪统治的终结·····	(331)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后日伪殖民统治的动摇·····	(331)
第二节 武汉地区的抗日斗争·····	(336)
第三节 日本投降和中山公园受降·····	(347)
第四节 抗战和沦陷期间的惨重损失·····	(357)
第十二章 武汉光复后“畸形”繁荣和衰败·····	(361)
第一节 国民党的接收·····	(361)
第二节 光复初期的武汉·····	(366)
第三节 “美援”和城市经济的病变·····	(371)
第四节 恶性通货膨胀与城市经济崩溃·····	(376)
第五节 航运与外贸的衰落·····	(382)
第六节 “大武汉市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流产·····	(386)
第十三章 武汉解放·····	(396)
第一节 全面内战引发的国共《汉口协议》·····	(396)
第二节 武汉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	(400)
第三节 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幻灭·····	(411)
第四节 武汉人民迎接解放·····	(418)
第五节 武汉和平运动·····	(425)
第六节 解放军合围武汉·····	(429)
第七节 张轸金口起义·····	(432)
第八节 四野十二兵团和江汉独立旅解放武汉·····	(437)
第九节 武汉解放的方式·····	(442)
主要参考文献·····	(453)

第一章

民初鼎革和北洋军阀统治

第一节 首义精英的涌现和民初政治力量重组

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展现出现代化的一线曙光,民主政治建设开始起步。但是,共和政体民主化进程坎坷,前景遥远,北洋军阀(尔后是国民党)把近代政治扭曲得面目全非。“民国”常常是一块招牌,而其内核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新式专制。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武汉的政权发生多次转换。从湖北军政府到北洋军阀统治、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政权六易其手。可以说,是历史上政局最不稳定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在整个晚清时期,武汉就是重大政治斗争多发地区。民国时,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内容在更新,频率在加快。

以共和政体取代皇权统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政制的一次飞跃。其宗旨,本来是要确立国家的民主体制,使政治纳入近代文明的规范。但是,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城市政治生活并没有真正步入现代文明轨道,只是在局部范围内有一些改进。

城市的政体,在辛亥武昌起义时发生了鼎革。武昌首义时,就推翻了设在武昌的清朝湖广总督署及所属的司、道、府、县衙门,并适时地在武昌建立湖北军政府,在汉口建立了军政分府。当时,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便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军政府起初以革命派

起主导作用,所实施的是革命政策,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由于革命党人的幼稚以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湖北军政府的组织和实践存在许多缺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黎元洪为首的上层势力对一些首义人士居功自大、各行其是、掌管实权不能容忍,乃利用革命派的急剧分化,加强其力量和地位,残酷镇压革命派,夺取军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使军政府逐步向反动政权演变。之后,袁世凯又强行调走黎元洪,瓦解武昌集团,先后由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督鄂,建立北洋军阀在鄂的统治。

鼎革中的宦海沉浮,人事升黜,显得五光十色。权力分配的斗争成为政局中的轴心。

辛亥革命后,湖北废除了总督、巡抚制,建立了军政府的都督制。1914年,袁世凯又废除都督制,实行将军制,置将军府于北京,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将将军制改为督军制,在湖北建立督军公署。1924年至1925年,督军制又改为督办制,督办军务善后事宜。1913年1月还推行军民分治,以都督或督军掌军事,由总统任命民政长负责湖北省民政,建立民政公署。同年5月,又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以加强中央集权。1916年7月,段祺瑞掌握实权,将巡按使改为省长,建立省长公署,从而形成了地方民政建制的基本定势。

民国时期政制、官制的变化,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武人专制。不管是都督总揽一切,还是军民分治;不管是中央任命,还是地方议会的选举,总体上是以民主形式实施武人专制或地方官僚主政。当然,也有辛亥精英登上政坛。

辛亥革命后,武汉地区的社会政治力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来属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势力日趋式微;原居于社会中下层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买办等)、城市的工商业主以及在革命后崛起的权力精英——首义军官等,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地位上升,形成新的政治、社会集团。

辛亥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一批首义精英,在全国,尤其是武汉政坛和军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如黄兴、宋教仁、蒋翊武、蔡济民、李书城、熊秉坤、张

难先、张知本、詹大悲、李四光、季雨霖、刘公、刘铁等，在当时的湖北军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尔后的政坛军界发挥了很大作用。另有一些辛亥革命人士，如居正、何成藩、张难先、田桐、万耀煌、石瑛等，在尔后的民国政坛上也很很有地位。首义精英形成为湖北、武汉政坛上新兴力量，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地区政治结构。尽管辛亥革命后旧的政治力量、中间政治力量大量存在，革命派内部也分化出一批新贵和官僚势力，他们跻身政坛，在位时呼风唤雨，下台后称霸一方，有的成为以权谋私的暴发户，有的沦为恶霸、汉奸，形成一种靠首义为资本的特权阶层。总之，辛亥首义后出现的政治精英和特权阶层，对民国时代城市社会影响深远。其所造成的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新的政治集团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力量。在辛亥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它们是鄂军政府赖以维持生存与稳定的中坚力量。

首义伊始，稳定城市的经济生活，为军政府当务之急。武汉工商业阶层在这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在首义战火的震撼和乱兵土匪的骚扰下，武汉三镇的商店、官钱局、票局纷纷关闭，金融官票贬值甚至废弃。为此，湖北军政府一方面通令官钱票照面值继续流通，不得拒用；另一方面，设立汇兑处，先设军人汇兑处，继而应商界之请，设商民兑换所，以保证持票人的利益。军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了武汉商界巨头们的支持。10月12日，武汉绅商百余人在武昌贡院聚会，决定商界自当日起一律通用官钱票，汉口商会也与汉口军政分府协调，蔡辅卿、李紫云等商界巨子出面奔走呼号，对于维持市面，稳定人心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武汉三镇向近现代工商业都市迈进，城市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中小工商业主阶层以及广大中下层市民，开始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民国前期，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买办的实力大为增强，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经济决定政治。经济上握有影响力，必定会在政治上具有相应的影响力。在湖北军政府时期及后来北洋军阀入主时期，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主阶层等新的政治力量在权力的分配、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新兴政治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旧的政治势力并没有完全

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初期,旧的政治势力集团经过改头换面,如总督、巡抚换成都督、民政长等,在地方政权中仍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这与辛亥革命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有着很大的关系,革命并未根本改变地方的封建政权。1911年10月18日,湖北军政府给各府、州、县的原地方官和自治公所(省咨议局系统的地方民意机构)发出通令,规定在全省范围内改专制为共和,实行“秩序革命”。由原来的知府、知州、知县把大印封好,派人送到军政府;有愿意留任的或者被地方挽留的,可以由自治公所同时附上一个详细报告,然后经都督黎元洪审核,一律换发新印,继续做民国的官;称呼也不用变,仍旧叫知府、知县,只是不再叫“老爷”。还规定自治公所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兴办警察和团练等地方武装,任务一是“惩治痞匪”,“驱逐乱民”,行使维护地方秩序之责;二是切实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酬其严守中立之道”。这种发一个通令、换一个印章的“革命”,当时叫做“传檄而定”,也叫“秩序革命”,或者形象地叫做“反正”。意思是:上面的命令一到,下面就马上有秩序地办手续,改旗换印,变帝制为共和,变清朝为民国。这种“革命”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当时的革命者却认为革命在迅速发展,引以自豪,并且进行得很认真。起义不到一个月,军政府就办理了全省六十九个县的换印手续,下了委任新知事的札子(清朝地方官的委任书。军政府的委札,同清制一样,格式也没有变),绝大多数都是原官留任,偶尔有个别新派去的,但极少有革命党人。这种所谓的“革命”,未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损害官僚、地主和外国人的利益,当然容易为旧势力所接受。可见,旧的封建势力在当时的各级政权中仍被大量地保留着。湖北、武汉地区的军权、政权仍被旧的政治势力所掌控。

黎元洪以首义都督而声名噪起。黎以宽厚为世所重,首义中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对稳定政局、抵制清军、号召全国起了积极作用。但民国成立后,国家政权落入袁世凯之手。而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加剧,首义的革命新贵热衷于权力的争夺。黎元洪感到革命派对自己的威胁,而袁世凯又进行拉拢,黎就一步步倒向袁世凯,瓦解、镇压革命党人,在南北议和中已倾向袁世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黎以首义都督的资本躐为副总统,和革命党人打交道,同时又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眉来眼去,做好了附袁的准备。

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角逐中,黎元洪成了左右逢源、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当初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革命党人先后举黎为副元帅、大元帅,后黄兴又建议选黎为副总统,不久同盟会在南京开大会时又选黎为协理。袁世凯对黎也收买拉拢,据传派密使携款一百万元,打通黎的亲信饶汉祥的关节,使黎陷入圈套)。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三个月就夭折了。4月1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终于挟实力而窃国,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并把首都迁往北京,进而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对革命派进行剿灭。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中国虽然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仍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沉沦。这种政治形势,使本来就属于旧营垒的黎元洪对武汉地区革命者翻脸相向,成为袁世凯打击革命力量的得力帮凶。

第二节 黎元洪拥袁自固

黎元洪被拥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从被动到主动,一步步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对中华民国的创建和湖北军政建设虽然也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但入民国后,拥护袁世凯成为其基本政治取向,而对湖北革命派则压制、排斥乃至分化和捕杀,造成了湖北政局的倒退。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湖北方面与上海方面就围绕政府首脑和各部部长人选发生过反复的争执。最后,上海和江浙集团以拥戴革命元勋为手段压倒了以首义为资本的武昌集团,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政府各部部长等要职也为上海和江浙集团所获得。武昌方面,除黎元洪取得副总统外,各部部长、次长未获一席,于是多衔怨望。湖北地区旧官僚和贪图禄位的革命党人勾结起来,亮出“拥黎、联袁、拒孙”的旗帜,湖北军政府迅速、全面走向反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发生南北建都之争。袁世凯力主建都北京,革命党人主张建都南京。黎元洪起初主张建都武昌,后公开倒向袁世凯,支持建都北京。黎把赌注压在袁世凯身上,认为袁世凯具有统领国家的实力,只有拥袁才能自固。

1912年1月,武汉一些追随黎元洪的革命党人,在上海成立民社,并在汉口成立民社的分社,实则该社中心在武昌。民社以卢梭的《民约论》的民主思想相标榜,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向孙中山和同盟会争权。其主要成员有孙武、刘成禺、张伯烈、孙发绪、张振武、蓝天蔚、宁调元、饶汉祥等;湖北军队的各师、旅长亦均入社,章太炎、汤化龙和一些立宪派对该社表示支持。

民社成立后,反对建都南京,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张,迎合了袁世凯的旨意。曾经在革命年代中有过贡献的孙武,由于在猎取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一职未能如愿,就和黎元洪打得火热,返鄂后附和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反动分子孙发绪,在湖北都督府会议上,放炮攻击孙中山,甚至煽动武昌和南京“脱离关系”。黎元洪纠合民社,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又实行裁军,以削减革命党人实力。当时,一部分革命党人尚掌握枪杆子,这对黎元洪的统治是肘腋之患。有些革命者居功自傲,对黎的权位不恭不敬,且相互之间矛盾重重。黎深感不能自安,力求铲除。在陈宦、饶汉祥、金永炎等幕僚策划下,黎高唱“军民分治”、“划一官制”和“统一财政”,并以裁军为手段来解除革命党人手中的兵权。

湖北在武昌起义后,军队扩充成五协,后增扩为八协,为了北伐,旋将八协改为八镇。后北伐停止,各镇就地整训。此时湖北一省拥八镇之师,从建制而言超过北洋六镇,深为袁世凯所忌,黎元洪也引以为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黎广植党羽,招揽私人。同时,将一些对自己有威胁的革命者,助送出洋留学,或以“进京重用”为名,请袁世凯将之调到北京,委以闲职;而大量的以裁军为手段,将革命党人遣送回籍。1912年5月,黎元洪以军队众多、财政支绌为辞,要求缩小军队编制,减少兵员。具体办法是保留鄂军一、二、三、四镇,裁去五、六、七、八镇,并将步兵每排三棚缩为两棚,每棚十四人缩为十人。各军裁退老弱士兵,少壮者则插补一、二、三、四镇。

1912年7月,黎元洪公布退伍条例,规定中将师长退伍金五万元,少将旅长二万二千元,以下递减,士兵则给饷一月。

在裁军中,黎力图将革命党人和异己分子裁汰。如“七镇统制唐牺支、八镇统制季雨霖,均确愿退伍出洋,拟均允许”^[1]。结果,唐牺支领了五万回湖南买田当地主。文学社的官兵几乎全被裁撤,李六如、李慕尧均因

文学社关系被迫退伍。

到1912年秋,湖北新军兵员裁去了一半。

在裁军中,因士兵心怀不平,要求增饷,官兵之间时起争执,乃至开枪动武。第一镇二协三标被裁士兵,对协统、标统夙多恶感,此时又被强迫退伍,酿成哗变。黎元洪派兵弹压,枪决首事者陈兆鳌。士兵抢夺军械,当场击毙军官二名。1912年7月,三镇十三标(驻黄陂)在退伍士兵鼓动下,杀死长官,断绝交通。

为了镇压士兵反抗,黎元洪宣布:“凡管带以上军官,皆有杀人权。捉获匪党,即就地正法,不必讯问。”于是,“武汉一带,侦探密布,每有无故被逮者,捕去后以一杀了事,投其尸于江中,并不宣布姓名罪状”^[2]。

黎元洪无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查封了《大江报》、《民心报》、《震旦公报》、《民国公报》、《自由日报》、《大汉报》、《教育杂志》等,杀害了进步编辑、记者凌大同、余慈舫,通缉胡石庵等。黎元洪以枪弹和刺刀埋葬了共和。正如蔡济民在《书愤》诗中云:“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3]

而在此时,革命党人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当时的革命者中,普遍存在“排满革命成功”的心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的思想,严重的软化和削弱了革命者的斗志。

部分革命党人,如孙武、蔡汉卿等,在秘密工作的年代里为革命赴汤蹈火,但在胜利后却经受不了考验,为了追求利禄,和黎元洪勾结,蔡汉卿甚至成为杀害革命党的刽子手。以蒋翊武等为代表的文学社成员,则遭到排挤,乃至裁撤、杀害,全社集体转入同盟会,树起拥护孙中山的旗帜,和黎元洪、孙武明争暗斗。原先已经联合的文学社、共进会,矛盾再起,纠缠不休。由于孙武为湖北人,蒋翊武为湖南人,对立矛盾又带有湘鄂派系的色彩,至于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员也与湖北地区的革命者无不颉颃。特别是在军政府任职的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张振武与一镇统制黎本唐、二镇统制杜锡钧、四镇统制蔡汉卿之间也是水火不容。

黎元洪利用革命派中间的矛盾,使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

还是在1911年11月底汉阳失守、武昌遭到炮击期间,四散逃走的一些

旧势力又纷纷回到武昌,集结在黎元洪的周围,以明枪暗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种种手段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全面夺取权力。

这时,经各省代表决议,湖北军政府已被认为是中央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通过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黎元洪又从中捞到了资本,俨然以各省民军的首领、未来中央政府的领袖自居,积极培植个人的亲信势力,军事方面依靠往昔旧部,文事方面则起用惯于写骈体文、以“垂涕而道”和“泥首以请”的沉痛词句来愚弄视听的饶汉祥等。都督府的秘书室,在革命党人任主任的时候,只是盖盖章、收收公文而已。黎元洪任大都督后,扩大秘书室组织,任命饶汉祥为主任秘书。规定“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政府”,权力大得惊人。秘书室成为黎元洪控制一切的特殊机构。

接着,黎元洪就开始一系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的活动。被首先开刀的就是护理总司令、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首先鼓动一些人举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4]。撤销战时总司令一职,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担任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谭人凤是老革命,又是蒋翊武的湖南同乡,蒋心里虽有意见,也不便反对。谭人凤志大才疏,又不懂军事,遭到许多人反对。于是,黎元洪又改派谭人凤为赴沪参加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下令恢复总司令一职,调他比较放心的吴兆麟担任。

在黎元洪等人的操纵和离间下,革命党人内部的派别矛盾迅速尖锐起来。黎元洪利用孙武来约束党人,孙则借黎的权势压制党人。黎派蒋翊武任江汉招抚使,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招抚之用。孙武就诬告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即派稽查队,半夜三更到蒋翊武家进行查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也就表面化了。

黎元洪起初是拉一部分打一部分,继之大开杀戒,把当年扶他上台的革命者抛进血泊之中。

第三节 倒黎反袁风暴

当黎元洪形成在湖北、武汉的一统江山时，革命者一步步识破了他的真面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酝酿成了民国初年迭起的反黎风暴。

1. 群英会暴动

群英会原是1910年前在武昌成立的一个会党性反清小团体，组织者为新军士兵向海潜。群英会与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关系密切，因文学社不吸收会党，群英会便加入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向海潜与大冶同乡黄申芑关系密切，因此黄申芑便成为群英会暴动的领导者。黄申芑为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军士兵，在会党中颇具声誉。孙武从日本返鄂组织共进会，便以黄申芑联络的会党及新军士兵作基础。1910年，黄为躲避清政府追捕出逃，武昌首义后归来，先任民军标统，继任禁卫军协统。他认为近卫军统制高尚志资历和才能在己之下，职位却在己之上，心中不服，曾到军务部质问。孙武却漫不经心地说：“统领不小呀，好好干”。黄以为这是对他的轻慢，逢人就说：“孙尧卿妄自尊大，我非打倒他不可。”其他一些不满于孙武的人便很快聚集在黄申芑的周围，组成“改良政治群英会”，策划武力倒孙。参与其事的还有由第三十一标组成的教导团，以及由士兵组织的义勇团等。他们中有人是基于对孙武与黎元洪倒行逆施的不满，有的是因为个人权欲未得到满足。

1912年2月27日夜，以黄申芑为首的起事者数千人，配戴群英会徽章，涌上街头，并声称“删除民贼，改良政治……只诛孙武一人”，随即包围了军务部及武昌大朝街孙武寓所。因孙武事先去了汉口，群英会未能逮住孙武，混乱中却将原文学社成员，第二镇统制张廷辅打死。事后，孙武在汉口发表临时宣言，自我剖白。说他只在某处存洋500元，某处存洋700元，20多只衣箱又是代某某存放的，怎能说是“挟资致富”？对于共和会、促进会、自由党、社会党、大同社、公益社，他虽列名为发起人，但从未出席过会议，怎能说是“结党营私”？最后他表示，这次“突遭身家之祸，心寒齿冷。今后